

黄伯伯是严谨治学、为人正直、生活简朴、淡泊名利的人。他嗜书如命，自认为，除了读书、用力组织和钻研科学问题以外，其他工作都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出国后再没有见到黄伯伯。2000年冬的一天，身在海外却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东方家园》栏目播放《20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大地之子黄秉维》的节目，得知他刚刚去世，让我悲痛不已。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15 楼的五位地球物理学前辈

在中国地震局的一间会客室里，挂有地球物理学界的已故科学家的肖像。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前五位在五六十年代都曾经住在15楼，都是我从小经常见到的尊敬的伯伯们。在我家的同一门里东侧就有三家，从上到下的三个单元分别住的是赵九章、顾功叙、李善邦。邻近的门里住的是陈宗器和傅承义。

地球物理学就是以地球为对象的一门应用物理学。从事高空、大气、海洋、地球内部物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这门学科自20世纪之初就已自成体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极为迅速。它包含许多分支学科，涉及海、陆、空三界，是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几个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我在六七十年代接触过石油勘探地震资料计算机数据处理，简称物探地震数据处理，就是应用地球物理的原理和方法勘探石油。所谓地震勘探，就是对大地发出声波信号通过检波器采集地球数据，即先给地球做“CT”扫描；接下来进行计算机数据处理，把声波变成图像；然后，找到异常点，分析确定异常目标。在百科全书里介绍地球物理学，如果从狭义理解，指的就是固体地球物理学。这一般又可分为两大方面：研究大尺度现象和一般原理的叫做普通地球物理学，利用由此发展出来的方法来勘探有用矿床和石油的叫做勘探地球物理学（或物理探矿学）。应用于工程地质勘探、工程检测的发展称为工程地球物理学，应用于环境探测和监测及环境保护而形成环境地球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已形成了独立的分支学科：地震学、重力学、地电学、地磁学，还有正在发展可能形成新分支的地热学。



○ 中国老一代的地球物理学家
(从左到右依次是：
陈宗器、李善邦、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卫一清、秦馨菱)

赵九章伯伯主要从事大气和空间物理研究，在前文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叙。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三位先生在地震学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宗器先生是1947年由他和顾功叙、王卓之、翁文波4人发起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首任理事长。五六十年代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是赵九章，副所长是陈宗器和顾功叙。他们和傅承义、李善邦都是一级研究员，他们那一代科学家在建国初期为新中国科学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顾功叙先生住我家对门。他是浙江嘉善人，早期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公费留学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赴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学系从事科研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顾先生毅然返回祖国。1949年后，他领导和指挥过鞍山铁矿、包头铁矿、大冶铁矿等矿区的地球物理勘探和研究，指导开展全国地球物理石油普查，对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和发现大庆油田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地震监测预报和深入探索地震本质的研究，发展了以震报震、以磁报震及地电、重力、地声、地应力等监测预报地震的方法，使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和科研水平跻身于世界前列。他身材不高，圆脸，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后来恢复得红光满面。他在1992年去世。

李善邦先生一家住一楼,他是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从事地震科学研究 50 年,为我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 1930 年,他就开始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地震台,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观测资料达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水平。他还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地震仪,定名为“霓式地震仪”(亦称 I 式),并在重庆北碚重建地震观测站,成为抗战时我国后方唯一的地震台。解放后,他参与编制《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编绘我国第一幅《地震烈度区划图》,为研究我国各地地震危险性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国家建设选址奠定了科学基础。他撰写的主要科学论著有 30 余部,还有多本科普著作,在晚年处于“文革”的恶劣环境下,带病写成长达 50 万言的科学巨著《中国地震》,为后人留下珍贵遗产。李先生身材削瘦,两眼炯炯有神。李太太好像是广东人,属贤妻良母型。他们家有四个子女,他的一个儿子李震荣(音)小时候曾和我在一起玩。一个女儿后来去了香港。

傅承义先生在 15 楼,是我们家的近邻,后来搬到黄庄小区又住我们三楼。他的大儿子傅祖明曾作为加拿大 CITA 计划来加拿大进修,和我合住过一个单元,我们有较多接触。他父亲曾留学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物理系攻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获硕士学位,后转赴美国深造,于 1942 年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地球物理学泰斗古登堡教授攻读地震学、地球物理学,1944 年获博士学位。

傅承义先生于 1947 年回国,就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主持地球物理研究工作。1953 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创建中国第一个地球物理教研室,1956 年又创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教研室,并于 1964~1966 年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地球物理教研室,分别主持领导这些教研室的工作,并担任第一任教研室主任,1973 年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及空间科学系主任。

傅承义在地球物理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 30 余载,在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傅承义的胞兄是傅鹰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胶体化学专家。兄弟俩同为 1955 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可谓双璧

联辉。

陈宗器先生是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早年曾去西北和罗布泊考察。他于1960年去世，我对他不熟悉，但陈伯母和我母亲关系密切，他的女儿陈雅丹和我姐都学美术，她们有很多联系。

陈雅丹在新浪网开的博客“雅丹小屋”<http://blog.sina.com.cn/chenyadan> 深受人们欢迎，我读到她的“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深受启发。她是一名艺术家，沿着父亲的脚步，大力推动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立项研究的提案，写了《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去过西藏和南极探险。

受株连致死的真菌学科学家邓叔群

邓叔群先生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关村14楼102号，对门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戴芳澜，而他当时是副所长。因为他们和家父都是生物学部学部委员，自然彼此都比较熟悉。

邓叔群是戴芳澜先生邀请到微生物所工作的，戴伯伯请来的当然是学术水准高的人。邓叔群先生192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荣获“斐陶斐”奖并被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回国后，邓叔群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教授，负责讲授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课程，并从事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其后，他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他在1948年当选为当时81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而后又在1955年，这81个院士中有46位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邓叔群依然是这46人中的一员。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论文近40篇，1939年出版了600多页的英文版《中国高等真菌》，而后在1963年又有一部影响深远的中文版专著《中国的真菌》问世，对我国真菌学，尤其对黏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回国近40年，截至1966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3400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50%（据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戴芳澜先生